

冷战与学术

美国的
中国学

1949-1972

张杨
○ 著

THE COLD WAR
AND ACADEMICS

Chinese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49-197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美国的中国学

1949-1972

冷战与学术

THE COLD WAR
AND ACADEMICS

Chinese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49-1972



扫一扫
获得更多新书信息

ISBN 978-7-5203-3602-4



9 787520 336024 >

定价：79.00元

冷战与学术

美国的
中国学

1949-1972

张杨
○ 著

THE COLD WAR
AND ACADEMICS

Chinese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49-197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冷战与学术：美国的中国学：1949—1972 / 张杨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7

ISBN 978 - 7 - 5203 - 3602 - 4

I. ①冷… II. ①张… III. ①冷战—国际关系史—研究②美国对外政策—对华政策—研究—1949—1972 IV. ①D819②D822.3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73225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耿晓明
责任校对 李 军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om>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0.25
字 数 301 千字
定 价 7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中美关系逆转与美国中国学界的“大清洗”	(21)
一 对华政策大讨论与美亚案	(21)
二 朝鲜战争与美国对华政策“舆论共识”的形成	(25)
三 麦卡锡主义阴影下美国中国学界的分裂	(29)
四 太平洋国际学会与远东研究的衰落	(35)
小结	(41)
第二章 知己知彼:学术研究的萎缩与资政研究的勃兴	(43)
一 美国对中国的恐惧与担忧	(44)
二 第一波高潮:走向资政目标的中国研究机构建制	(50)
三 第二波高潮:1958年《国防教育法》与联邦资助下的 机构建制	(61)
四 美国官方引导下的中国学知识的生产与应用	(73)
小结	(91)
第三章 中美尖锐对峙时期学院派中国学的曲折发展	(93)
一 “中国比苏联更具威胁”界定下的中美关系	(94)
二 边界模糊:中国学的“任务”导向研究与学术研究	(99)
三 学术论争:政治透镜下的学界生态	(114)
四 政治分野:“院外援华团”与“红色中国院外集团”	(127)
小结	(153)

第四章 中美冷战对峙与战后亚洲中国学的创生	(155)
一 冷战需求:从“敌情研究”到“资政研究”	(156)
二 费正清:学术关切与责任意识	(164)
三 亚洲中国学:研究议程设置和学科思想传递	(171)
四 亚洲中国学发展中的本土因素	(186)
小结	(194)
第五章 回归理性:中美关系转折期的中国学	(196)
一 大气候的转变与政策调整压力的增强	(197)
二 学术共同体的立场转变:从学术精英到学术团体	(207)
三 中国学界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途径和方式	(216)
四 艰难的调头:学术压力集团与“院外援华团”的 最后博弈	(227)
小结	(238)
第六章 战后美国学术与政治关系的嬗变	(240)
一 专业还是公众:学术共同体的永恒争议	(241)
二 精英知识分子:国家观念、学术伦理与个人选择	(249)
三 若即若离:官方与学术界关系的嬗变	(260)
小结	(272)
结语	(274)
附录一:缩略语	(282)
附录二:中国学专家	(285)
已刊和未刊文献	(295)
中英文参考书目	(306)
后记	(317)

前 言

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冷战产生的社会与文化效应，特别是冷战影响下“政治与知识”（官智）互动关系的研究已经日益引发关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新的思维框架和角度，多元档案材料的运用，深刻的历史与现实内涵，使这一学术方向呈现出勃勃生机，并有充足的待拓展空间。中美关系是冷战时期最为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冷战前期双方处于尖锐对峙状态，美国一度视中国为“比苏联更具威胁”的敌人，这一夸大的“中国威胁”形象反过来强化了美国对华敌对与遏制政策。在中美对峙的历史背景下，美国中国学（Chinese Studies）^①因应“冷战需求”迅速繁荣与发展，并以一种特殊方式介入美国对华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各个环节。冷战时期美国中国学的发展实态清晰揭示出学术研究不可替代的“资政”作用，政治资金和政治运作对学术的反作用力，以及政治与学术间相互渗透而产生的张力。除此以外，“冷战共识”（Cold War Consensus）^②压力下中国问题专家个人的政治倾向、学术思想、价值尺度乃至命运沉浮，亦成为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本书尝试思考并解答以下几个问题：

① 传统汉学主要是对汉语及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研究，中国学则关注当代中国各个领域的研究，并强调社会科学方法的运用。

② “冷战共识”，1945—1950年间兴起，直到1960年代末仍有很深刻的社会影响力。这一时期，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美国社会普遍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共产主义致力于控制世界；必须反击共产主义扩张到其他国家的企图，反对其在美国进行颠覆活动。Milton J. Rosenberg, “The Decline and Rise of the Cold War Consensus”,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Vol. 37, No. 3 (March 1981).

其一，“冷战需求”与美国中国学之间的关系，即美国行政机构为何要资助中国问题研究，以及如何利用中国学知识和中国学专家为美国的冷战政策服务？

应该说，“认识你的敌人”是冷战第一需要。美国冷战战略的核心文件——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 68）——指明了美国当时的首要任务是“了解你的敌人并利用其弱点”^①。从美国已有的知识储备来看，二战前，美国对非西方世界的关注仅限于利益攸关的拉美和作为文明参照对象的“东方”（中国与日本）。而就中国研究（汉学研究）而言，也多限于语言和历史，对当代中国的经济、文化、地理、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等，少有人涉猎。1943年，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SSRC）做的一份调查认定，美国事实上没有所谓“地区问题专家”（regional specialists）。^② 这种情形之下，美国培养中国语言和当代中国问题专家的急切心情就可以理解了。

随着中美冷战对峙的持续，特别是由于中美之间相互隔绝的状态，美国政府需要有关中国的全面知识来作为决策基础。其时，美国国务院、国防部、美国新闻署和中央情报局等政府部门与美国各大名校建立起密切联系，进行了广泛的合作。除了通过“管道组织”（conduit）^③ 资助这些学校成立中国学研究中心或建立中国问题研究项目，行政机构各个部门还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中国学会议研讨、著述的出版发行、创建学术团体等活动，以此来获取决策或行动所必需的情报、信息和知识。这一时期，官方资助下的学术活动都具有明确的

① NSC - 68, 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Programs for National Security, Apr. 14, 1950, Database: *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 (hereinafter cited as *DDRS*), Gale Group, Inc., CK3100347913; Michael Waller, *The Public Diplomacy Reader*, Washington, D. C.: The Institute of World Politics Press, 2007, p. 110.

② Noam Chomsky, Ira Katznelson, et al. eds.,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versity, Towar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Postwar Years*, New York: Free Press, 1997, p. 197.

③ “管道组织”是指一些中间媒介，秘密接受诸如中央情报局这样的国家安全机构的资金支持，为国家安全机构寻找其感兴趣的学术机构、学生组织或个人，并资助特定项目的实施。目的是为了规避安全审查和外界监督，避免引发学者群体或学生群体的反感，促进项目的顺利进行。类似的名称还有“前线组织”“隐蔽组织”“虚拟组织”（dummy organization）、“无实体组织”（paper organization）等等。

政治指向，如资助“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AS）召开主题为“中国政治体系的微观社会学研究”学术会议；资助有关“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中共政治体系内部的政治沟通问题”等的课题研究。与差不多同一时期形成的苏联学一样，美国中国学在“学术性”研究中带有极强的政策导向，与情报和军事机构有着顺畅的合作渠道。^①可以说，包括中国学在内的区域研究^②为美国的冷战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基石。

从冷战对抗的角度来说，因应不同时期大的冷战主题，美国政府需要中国问题专家为其设计冷战项目，甚至直接参与到冷战行动中。现有研究已经表明，在有核时代，东西方冷战之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心之争”，特别是在中间地带赢得拥趸和影响力的竞争。然而，美中关系较之更为复杂。就中美冷战对抗而言，其最大的特殊性在于地区热战、战争边缘和“人心之争”三者兼而有之，因此不仅大的冷战决策异常困难，就连具体的行动策略也颇具挑战性。在东南亚、东亚和非洲，中美双方一边在试探对方的底线，一边亦在试图证明：谁是世界历史进程的代表？谁更适合充当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样板？谁在各种特定群体中更具影响力？盖源于此，美国决策者和项目实施者需要对中国有更为深刻的了解，才能有的放矢地设计针对中国的各种冷战项目。以“海外华人项目”为例，20世纪50年代初，中美在东南亚地区的意识形态对抗异常激烈，东南亚华侨成为美国政府关注的焦

^① David Horowitz, “The Making of America’s China Policy”, *Ramparts*, Oct. 1971, p. 46.

^② “区域研究”是指对某一特定地区使用社会科学的各种手段进行专门研究，中国学即是区域研究的一部分。（[美]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陆惠勒等译，章克生校，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393页。）尽管针对某一外国区域进行专门研究并非新生现象，但利用多学科的知识和分析方法，对某一区域或文化进行系统研究是战后才开始的。区域研究项目通常有如下目标：其一，为学术研究和教学、政府机构、商业和新闻业培养区域专家；其二，提供针对某一区域的研究机会；其三，推动大学课程表中不常见的学科的发展；其四，通过对外国文化的比较研究深化对美国文化的理解，扩大教学的范畴。见 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External Research Division, “Area Study Programs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1959, p. 1. 有人认为区域研究并非学科，而是一种研究方法。本文无意就概念进行解析，但从今天学术界的现状来看，区域研究即便不是一个学科门类，也应当是一种多学科复合体。

4 冷战与学术：美国的中国学（1949—1972）

点，美国新闻署、中央情报局和对外援助机构共同发起了“海外华人项目”。该项目致力于“消除共产主义在海外华人中的影响，……促进海外华人成为自由世界负责任的、积极的参与者”^①。康奈尔大学人类学家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到东南亚进行考察后认为，东南亚华侨并非共产主义者，但他们都希望一个强大的中国政权能够给予其保护和荣耀。为了将这个群体吸引到美国和台湾一边，施坚雅建议要对其加以宣传和引导，特别要强调“中国的经济状况，以及大陆新社会与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协调性”。由于施坚雅所在远东研究系和政府机构之间已经建立起联系，因此他的报告很快被递交美国国务院和美国新闻署，作为美国对东南亚华侨的心理战策略推行下去。事实上，“中国通”参与了广义上“海外华人项目”的制定和实施过程，并从人类学、文化和历史等视角全面评估了东南亚华人华侨的性格和文化特征、心理状态和可能的政治倾向。

在冷战期间政治与知识之间关系的探讨中，美国构建“知识迁移”的大战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战后美国影响力的扩张是全方位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包括中国学在内的区域研究也在相当程度上承担了美国力量投射的责任。毋庸置疑，传统汉学研究的重镇在欧洲，传统汉学强调语言的学习、中国古典文献的考据，以及中国文学的解读。而美国的中国学从一开始就关注当代中国问题，特别关注政治走向、社会危机、制度变革等问题，也因此需要包括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在内的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从战后到1960年，美国中国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此同时，美国开始了知识向外输出的过程，中国学亦成为美国影响力扩张的重要工具。本书第四章以亚洲基金会和费正清的活动为个案，探讨了战后美国异常主动地对亚洲学术研究进程施加影响的历史，以及亚洲各地区的回应。无论承认与否，美国的资金介入和教职人员的单向流动，阻碍了知识的正常流播，当下美国中国学的世界影响力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另举德国为例。战前美国的学科建制和研究路径很多习自德国，战后这种情况发

^① Hong Kong, Apr. 14, 1954,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The Asia Foundation Records, Box P-55, Hong Kong, Budget General 1954/55.

生了逆向改变。德国波鸿大学（University of Bochum）的东亚研究所完全按照美国模式的院系结构组织起来，由一系列相关跨学科机构支持。东亚研究所的八个讲座教授席位由地理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充任。柏林自由大学（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的欧洲汉学与美国本土中国学之间的竞争更为明显。其时，尤根·多梅斯（Jurgen Domes）和罗文塔尔（Richard Lowenthal）等人主要依托奥托·苏尔研究所（Otto Suhr Institute）从事近代中国研究，他们与柏林自由大学的传统汉学家时常发生冲突。然而，尤根·多梅斯从美国那里获得了支持。奥托·苏尔研究所与南卡罗莱纳大学的国际研究所签有国际合作协议，双方就台湾“地方政府”展开了研究，并建立了正式的长期学术交流。^①美式中国学研究由此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在有关冷战需求与中国学发展之间关联的探讨中，还有一个层面的问题需要加以关注，即冷战所激发的那种全民参与的紧迫感。与美国“孤立主义”传统一脉相承，美国公众的乡土主义（provincialism）——对美国以外世界知识的轻视与无知，对与己利益无关事务的袖手与冷漠——一直为人诟病。然而，随着战后美国影响力迅速遍及全球，并且在冷战中确立了所谓“世界领导地位”的战略目标，美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将目光对准公众教育，试图发动公众支持美国的冷战政策并参与到为维护“自由”而进行的冷战对抗中。更重要的是，在连通左右政治派别的“和平”语境下，他们认为必须让美国人充分了解其他地区人民的信息，这样美国才能保证战后和平。1956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为“公民外交项目”（People-to-people program）背书时明确提到，“在这场敌对生活方式之间展开的宏大斗争中，我们美国的意识形态若要取得最终胜利，就必须得到成千上万独立的私人组织和团体，以及美国公民个人的积极支持，通过

^① Letter from Amos A. Jordan, Jr., Colonel, USA, to Mr. Pendleton Herring, SSRC, "Report on the Status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in Germany," Aug. 3, 1966, 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 (RAC), Collection SSRC, RG Accession 2, Series 1. Committee Projects, Box 104, Subseries 12. 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 Files, Folder 1151-1160, pp. 6-7.

6 冷战与学术：美国的中国学（1949—1972）

你们与国外公民间的联络（来传递我们的思想）”^①。从这个层面来看，美国政府资助包括中国学在内的区域研究，既有在美国国内进行冷战政治动员的动机，又不乏使每一个美国人都参与到冷战活动中的意图。而这一类似社会动员性质的教育和宣传活动，在冷战初期的美国是被广泛接受的。毕竟在很多人看来，美国公众的乡土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学术界的责任，是美国大学的失误。^② 美国大学有必要承担起教育公众的责任。

其二，美国的中国学，广而言之，美国区域研究的动力源和推动力量究竟是什么？区域研究是否真的沦为美国冷战的辅助工具？官方介入对中国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同大多事物或现象一样，美国中国学的发展走向始终徘徊在其内生动力和外部压力之间，端看特定时期哪种力量占据上风。常识告诉我们，不会有一种力量永远占据上风，因此中国学的发展走向也必然是合力作用、曲线向前的结果。然而，若论动力源，区域研究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门类最大的区别在于，其源动力虽然不乏学术追求的因素，但主要推动力却是现实需要，或者更具体一些说，是美国的冷战政策需要。^③

麦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曾经说过，“区域研究的首个重要研究中心创建于战略情报局”^④。二战时期，大部分有区域研究专长的学者都被征召至政府部门服务，著名的中国通费正清亦曾是战时新闻处雇员之一。^⑤ 战争结束后，这些人员陆续返回高校，后来大

① James Hagerty, "Press Secretary to the President," May 31, 1956, Dwight D. Eisenhower Library, available at http://www.eisenhower.archives.gov/research/online_documents/people_to_people/BinderV.pdf.

② Robert B. Hall, *Area Studi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ir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1947, p. 22.

③ Robert B. Hall, *Area Studi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ir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s*, p. 12, p. 16.

④ 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

⑤ John Fairbank, *Chinabound: A Fifty-Year Memoir*,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2; Matthew D. Johnson, "Propaganda and Sovereignty in Wartime China: Morale Operations and Psychological Warfare under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45, No. 2 (Feb. 2011), p. 315.

多成为区域研究的中坚力量。随着冷战的到来，在美国官私机构的资助下，美国区域研究开始蓬勃发展起来。从国内政治史的角度来看，冷战对美国最大的影响恐怕还是以“亚战争”的状态来进行社会动员并对国家安全资源进行相当程度的综合计划运用。特别是在冷战初期那种“冷战共识”的氛围中，大学和学术被当作重要的国家资源。这一时期，不断有人呼吁：大学里的区域研究项目严重不足，各基金会尚未从战时恢复过来因而无力支持类似的项目，应当建设一个有关战略需求和大学资源的储备库；甚至有人提出建立一种机制，在大学与学院教职人员和政府机构之间建立起直接的渠道，使政府可以实际应用大学教师的研究成果。^① 本书第六章即探讨了包括区域研究在内，美国社会科学界围绕“联邦资助学术研究”展开的争论，并在考察相关证据后得出结论认为：当美国政府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已经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一部分，并准备将其纳入公共政策中时，社会科学共同体认同这一点，并视其为无法逆转的趋势；部分社会科学家甚至试图以此为契机来推动美国的社会科学发展，并参与到社会权力和国家权力的分享与分配中。而在所有社会科学研究分支领域中，区域研究尤其得到联邦政府重视并得到更多的资助。因此，断言“冷战需要”是美国区域研究的源动力，并不为过。

战后二十年间，美国联邦资助区域研究有着充分的政策支撑和立法保障。在冷战国家安全体制（National Security State）^② 下，美国政

① Memorandum for All Assistant Directors, CIA, From Director of Training, undated, CIA's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Electronic Reading Room, (hereinafter cited as CIA FOIA), CIA - RDP55 - 00001A000100050023 - 6, available at http://www.foia.cia.gov/nic_china_collection.asp; Eliot S. Berkley, "A Program for Participation in Government by College and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Faculties", Feb. 20, 1951, CIA FOIA, CIA - RDP55 - 00001A000100050040 - 7.

② 亦有学者译为“国家安全国家”。二战以后，美国人意识到在核时代美国本土不可能再像从前一样免于战争的茶毒；苏联被视为一个可能的侵略者，而美国是唯一能够遏制苏联威胁的国家。在此背景下，孤立主义被抛弃。随着美国力量扩展到世界每一个角落，美国决策者越来越多的使用“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话语来诠释政策，国家安全事务主导了预算支出和政府的议事日程。国家安全机制最显著的特征是政府全面改组了联邦机构，成立国防部、空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等机构。此外，国会也进行了相应调整，以满足所谓“国家安全需求”。参见 Michael J. Hogan, *A Cross of Iron: Harry S. Truma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1945 - 1954*,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2 - 4.

府深度介入各高校区域研究中心的创建和运行中，相关实例不胜枚举。以“区域专家培训计划”为例，1950年，为解决行政机构各部门缺少区域问题专家的状况，在预算局的主持下，国务院、国防部、陆军部、海军部、空军部、联邦安全署（Federal Security Agency）、中央情报局、经济合作署（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国会图书馆、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Resources Board）、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和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等机构代表连续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增强大学的区域研究能力，同时为政府雇员获得区域知识能力提供机会。这一计划开启了行政机构与大学区域研究中心的长期合作渠道。^①即使在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末官智关系的重大倒退后，到70年代末，联邦政府仍旧为全美80个区域研究中心提供近10%的运行经费，这并不包括联邦提供的诸如教学津贴、论文研究补助或教师海外考察等经费。^②事实上，这些不过是联邦资助中公开的公共经费部分。那些秘而不宣的项目合同、个人资助计划和通过私人基金会提供的资助很难有完全的数字统计。

从立法层面来看，为中国研究和亚洲研究提供资助的相关立法有：（1）根据美国480公法，教育办公室负责管理的“外国研究拓展项目”（Foreign Studies Extension Program）和国会图书馆负责管理的“海外图书获取项目”（Overseas Acquisitions Programs），都可资助区域研究；（2）根据《国际教育法》（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ct），年度拨款中的绝大多数用于资助大学本科教育中的国际研究；（3）1958年《国防教育法》第六款和《富布赖特—海斯法》（Fulbright-Hays Act of 1961）确认了政府资助学术研究的合法性，到20世纪60年代末，两者拨款总额达到1800万美元，绝大多数用于支持美国学

^① Memorandum for All Assistant Directors, CIA, From Director of Training, undated, CIA FOIA, CIA - RDP55 - 00001A000100050023 - 6; Memorandum for Director of Training, Area Training, 1959, CIA FOIA, CIA - RDP63 - 00309A000100020055 - 4.

^② James A. Perkins, *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Foreign Language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Background Papers and Studies*,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Nov. 1979, p. 169.

院和大学的语言与区域中心；（4）国务院教育与文化交流项目，60年代中期峰值时期，拨款达5290万美元，部分款项用于大学区域研究；（5）史密森协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全国艺术与人文基金会都有用于亚洲研究的相关拨款。^①在上述经费支持下，联邦资助区域研究的范围由精英大学扩展到一般大学，有关斯拉夫、拉美、近东和中东、非洲、日本、东欧、南亚、西欧等区域研究中心在各大校园筹建成立。统计数据显示，1958年政府资助的区域与国际研究中心有19个，到1972年增加到106个。^②

在区域研究学术史中，一个一直存在的核心争议是：区域研究是否真的沦为美国冷战的辅助工具？^③如前所述，“现实需要”对美国区域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可否认的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政府和私人基金会对区域研究的投入主要出于国际政治考虑。早在195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国际社会科学通讯》（*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Bulletin*）就筹办了一期关于“区域研究”的讨论，参加研讨并发表论文的杜洛塞尔（Jean B. Duroselle）和汉斯·摩根索都认为，区域研究毫无疑问是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加速推进其外交政策的必然结果；学者们被有机地组织起来，致力于研究由某些地区、国家或组织引发的问题，并传播这些科学知识；从更高的智识层面来说，区域研究的主要动力还是现实需要，甚至哪些区域被

① Ward Morehouse, Director,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rograms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State Education Department, University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Asian Studies and Federal Legislation: A Status Report”, Sep., 1969,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Pardee Lowe Papers, Box 253, Folder: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pp. 6-8.

② “Post World War II and the Emergence of Title VI Language and Area Studies Programs”, U. 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vailable at <http://www2.ed.gov/about/offices/list/ope/iegps/history.html>.

③ 一种比较悲观的看法是：我们远远没有接近学术（专业）和权力之间关系的真相；现有可以获得的“证据”是非常碎片化的，“国家安全体制”内部的关键档案基本没有得到解密，因此，不太可能对区域研究与国家（权力）间的关系做出清晰界定。Bruce Cumings, *Parallax Visions: Making Sense of American - East Asian Relation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253.

选来优先研究也是出于现实需要。^① 美国学者布鲁斯·卡明斯（Bruce Cumings）考察了美国官私组织利用部际外国区域研究协调小组（interagency Foreign Area Research Coordination Group）机制进行合作的历史并总结说：在某种程度上，外国区域研究协调小组中国分委会塑造了当代中国研究，它使学术研究与国家需要和福特基金会的资金流向保持一致。^② 冷战时期，类似外国区域研究协调小组这样的机构还有许多，它们存在的主要职能就是把私人研究和冷战需求结合起来，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也是这样一个中介组织。^③ 事实上，有相当数量的学者认为，区域研究的快速发展“源于外交部门、（二战时期的）战略情报局以及其他辅助部门的架构……人们可以从遍布各处的区域研究项目中发现战略情报局的前雇员”^④。至少在冷战尖锐对峙时期，区域研究的主要推动力是现实需要，区域研究因应国家安全需要而产生和存在。

然而，持不同意见的学者数量也不在少数。被誉为美国区域研究首倡者之一的罗伯特·豪尔（Robert Hall）承认区域研究的主要推动力是现实需要，但同时认为区域研究的源动力是学术。^⑤ 在他看来，

① Noam Chomsky, Ira Katznelson, et al. eds.,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versity, Towar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Postwar Years*, New York: Free Press, 1997, pp. 206-207.

② Bruce Cumings, "Boundary Displacement: Area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during and after the Cold War",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Vol. 29, No. 1 (1997), p. 21.

③ 就政府对社会科学的需求而言，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从二战结束后的定位就是：“积极承担起解决由‘联邦政府扩大对研究的兴趣’所引发问题的智识领导角色。” SSRC Minutes,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Carmel, N. Y., Sep. 10-13, 1945, 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 (RAC), Collection SSRC, RG Accession 1, Series 9, Box 357, Folder 2098, pp. 7-8. 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当官智合作遭到普遍质疑时，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仍然坚持自己的责任是：“寻求在大学中鼓励新的项目，使社会科学研究更多应用于社会，使社会科学家在研究与政策之间起到更好的联结作用。” Annex 1, Gene M. Lyons, Summary of Remarks to the SSRC, Sep. 11, 1967, 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 (RAC), Collection SSRC, RG Accession 1, Series 9, Box 363, Folder 2130-2137, p. 3.

④ 尽管态度不尽相同，但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西格蒙德·戴蒙德（Sigmund Diamond）和耶鲁大学历史学家罗宾·温克斯（Robin Winks）都同意区域研究源自战时的情报工作需要。Bruce Cumings, *Parallax Visions: Making Sense of American - East Asian Relation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254.

⑤ Robert B. Hall, *Area Studi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ir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1947, p. 12, p. 16.

区域研究要从三个层面来解读：（1）从学术专业角度来看，学者们强烈希望能够突破学科界限，培育某种知识杂交成果，纠正当前学术结构中公然侵犯知识统一性的问题。（2）从学术功能的角度来看，战争已经表明知识是国家的紧迫需求，学术研究对国家负有责任，责任之一就是必须能够对外国事务给出正确的答案。从更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说，不了解世界的其他区域，就没法很好地对自己做出判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方法有重要价值。（3）从培训和教育的角度来看，战后世界给美国提供了巨大的机遇，同时也带来的巨大的责任，美国政治和商业领域亦需要大量区域专业人才。^①也就是说，如果对区域研究进行功能拆解，就不存在区域研究到底是源于学术本身，还是源于现实需求这个问题了。剩下的问题仅是不同时期，到底哪一种推动力占据主流。

事实上，并没有人反对区域研究的产生源于美国学者学术视野和研究兴趣的扩展，源于社会科学带来跨学科的研究冲动，源于其时占据主导的科学主义思潮。并且，即便是在“冷战共识”时期，也有相当多的学者始终坚持学术性追求。只不过，官智密切合作、行政机构介入区域研究是其时更为显性的现象，在当时的国家安全体制下，知道内情的人亦认为理所应当。所以，直到20世纪60年代因“亚瑟王事件”^②导致的官智关系的大曝光，美国学术界才真正进行反思。“亚瑟王事件”后，一些学者仍然坚持原来的政治关切，继续用美国的视角和模式来解读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另一些学者则开始了新的探索。不仅如此，由于区域研究的学术性探究一直没有中断，由于美国学术传统中不断质疑和批判的精神始终存在，经过战后20多年的发展，区域研究所有分支领域都拓展了研究范畴，越来越多地展开了自己的研究日程、学术争论和研究轨迹。到70年代中期，就连各区域研究领域之间，在研究方法、核心问题、关注焦点等方面亦

^① Robert B. Hall, *Area Studi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ir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s*, pp. 10 - 11.

^② 本书第六章会对“亚瑟王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详细解读。